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 7-5617-3465-4

I.庆... II.华... III.徐中玉-纪念文集  
IV.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9692号

## 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

编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封面题字 王元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6开

印张 18.75

插页 10

字数 418千字

版次 2003年9月第一版

2003年9月第一次

印数 1100

书号 ISBN 7-5617-3465-4/Z·022

定价 38.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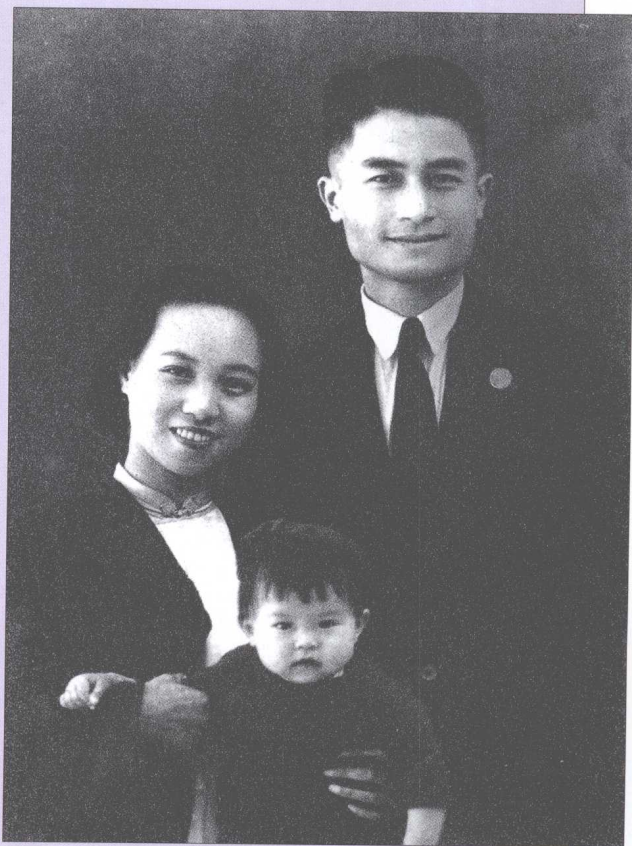


徐中玉教授近影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1936年在青島國立山東大學求學時攝于海濱公園



1943年與夫人、大女兒攝于廣東韶關



1978年攝于泰山南天門

慶祝徐中書先生九十壽辰文集



1996 年与夫人摄于美国



1989 年摄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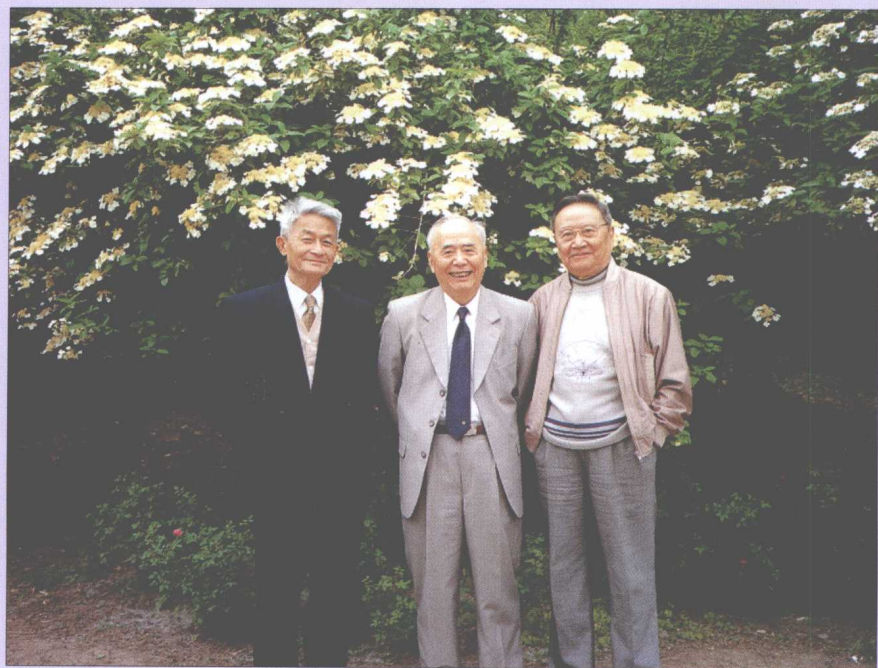


1997 年春摄于四川  
眉山三苏祠东坡像前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偕上海作協同仁拜望巴金（1996年）



与王元化教授（右）、钱谷融教授摄于扬州（2001年）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壽辰文集



与公木教授合影  
(1985年)



与王西彦先生  
(左)、王辛笛先  
生合影 (1995年)



与柯灵先生  
合影 (1995年)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1999年春摄于  
台湾林语堂旧居



与郭绍虞教授（中）和  
程千帆教授合影（1980年）



与许杰教授（左二）、  
钟敬文教授夫妇合影  
（1985年）

## 賀徐中玉先生九十華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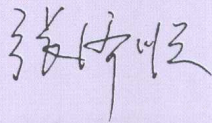
值此火紅盛夏、蘭芳盡舒之季，欣逢徐先生九十華誕慶，我謹代表學校並以我個人的名義表示衷心的祝賀和誠摯的敬意！

悠悠九十春秋，先生德以修身，勤以治學，著述等身，成就卓彰。所編《大學語文》，二十年間，印發一千餘萬冊，澤被華夏莘莘學子。主編《文藝理論研究》，為學界公認該領域權威之刊。視野開闊，力求宏觀，又兼得一專之長，善有見微知著之功力，是為先生心往之境界，同時也為年輕後學指明了方向。力戒浮躁，虛靜深思，“銖積寸累，總可陳功”，更為後人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警醒和勉勵。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迄今，先生執教七十餘載，春風化雨，教書育人，桃李飄香。所培養才俊，今亦多為學界中堅或建設棟材。尤為值得稱頌的是，先生多年以來，愛國懷民，追求真理。雖曾經顛沛坎坷，大起大落，但於國於民之真誠不渝。七十高齡入黨，“歸屬於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為人類服務的高尚目標、理想”。高尚情操，志士品格，堪為風範。凡走近先生者，尤感先生思想之清晰敏捷丝毫不遜於年輕後輩，常令人感受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同學少年”之情怀。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我國和上海城市的發展為背景，華東師大正面臨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時期。回顧既往，經以先生為代表的幾代師大人的努力，我校累創輝煌，享譽遐邇。思量未來，全校師生將以先生之德行為楷模，薪火相傳，與時俱進，為實現學校新一輪發展戰略而奮發努力。

衷心祝願先生健康長壽，企盼繼續得到先生的指點！

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



2003年7月

慶

祝

徐中

文集



丁原自素：孤身幾

百尋凌霄不屈已得

地有虛心歲冬根彌

壯陽踏紫更蔭明

時思好愜愿斷五

弦琴

右系荆公詩

祝賀

徐中玉教授九十壽辰

瑛末春月

清園王元杞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賀徐中玉教授

九十化誕

張各坤敬  
二〇〇三·七

大坪弄雪  
己未年仲夏  
小我石菴

祝

中玉先生九十华诞

從來學術貴坦誠  
何意因循左獨鳴

所幸教壇容眾論  
真知灼見育羣英

王三平  
笛  
二〇〇三年七月  
時年九十有二



慶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

# 我的自述

徐 中 玉

—

我生于1915年2月15日。故乡江苏江阴。家里没有一亩地、一间屋。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着清贫生活。两个姐姐都只读完初级小学便辍学在家，给袜厂摇洋袜挣钱了，家里只能培植我这个男孩。我小学毕业后去邻镇杨舍（即今张家港市治所）读到初中毕业。接着考上免费还可供饭的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按章老实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凭服务证才得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转入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又去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至今始终没有脱离校门做过别的工作。读师范时不用花费多少，读大学一年级时花的是当小学教师工资的积余，后来一直即靠写稿自力更生。高中以前我一直未知茶叶为何物，以为茶梗也算茶叶，因那时祖父当家，尽量节约，从不买茶叶，夏天便喝家里自炒的“大麦茶”。这种家境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走出来的。“五四运动”兴起时我还很小，读初中时才听说有这个运动，要打倒卖国贼。那时提出民主、科学、新道德这些要求，再晚一点才大致明白。“五四运动”虽然间接却仍给了我这个江南乡镇初中学生重要影响。我现在仍感谢前辈们这个先行的业绩。八十多年来我们已有了不少进步，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再对我们为所欲为了，旧军阀打倒了，租界和治外法权收回了，很多国耻纪念游行已不必举行了，都是好事。当时提出的较高要求至今仍待我们努力去达到。进步没有止境，纵向比较必须同时再作横向比较，才不致浅尝即止，自满不前。多少年来我们缺乏危机感，失去紧迫感，似乎闭关锁国没关系，自我感觉曾还好得很。

我可以不读私塾而进初级小学了，教师不是“秀才”先生而是多少受过新思想熏陶过的人。江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乡镇子弟家境稍好便去常州、无锡、苏州升学，有些教师就是回乡工作的这种人，脑子里多少有点新思想。记得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校牌上都写有“新制”字样。祖父常说“这种学堂洋派多了”，又称“洋学堂”，主要指其“开通”。语文课本开头教“人、手、足、刀、尺”，不是《三字经》。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肃立向上升的“红、黄、

蓝、白、黑”五色国旗敬礼。

六年小学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五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5月4日是纪念五四反帝反卖国贼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是我们手执小旗上所写和跟着教师口里高呼的口号。纪念实际为了提醒不可忘记耻辱。1928年5月3日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我济南，打死中国军民，杀我外交官蔡公时。这后面是5月9日，还有“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市民。华士镇虽不大，周游也要一两个小时。当时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重要作用。后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奋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个人有了了不起的力量，而是说每个人于国家民族兴亡，都要负起自己应该并可能承担的责任。当时一听到列强要把我国“瓜分”，迫使我们当“亡国奴”，就极为愤恨，既想到国家民族受欺压自己连带要受罪，自然便想到为此自己即应承担一份责任。

国应当爱，人类也应当互爱。当存在国家与民族之别的时候，当然先应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然后再推及世界，人类。自命超越，连本国本族都不爱，就谈不到泛爱世界与人类。厌恶甚至痛恨本国本族确实存在的弱点、缺点，正是由于爱，希望变好，“恨铁不成钢”，不是一味恨而实在爱得极切。这里有祖宗庐墓，有父母兄弟姊妹，有亲戚朋友，有故乡山水，有优良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基本一致的现实利害关系，在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如此自在、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历来志士仁人都有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这是爱国思想最重要的基础和来源。这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千百年来政权时有更迭，有好有坏，好坏无常，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并未时有时无。当然，进步、开明的政权能使人民的爱国思想更强，凝聚力更大。我们过去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旧政权，恰恰相反，很多知识分子对它持批判甚至反对的态度，因而才显示出深刻的爱国之心。

江阴有个小小典史阎应元是著名的抗清反暴英雄，他率众扼守江阴孤城，力抗满清南下大军八十多天，最后失败牺牲。江阴因此被称为“忠义之邦”。阎应元原就住在华士镇郊乡村。他就是从我故乡奉召去县城任典史之职的。死后乡人为纪念他的忠烈，建立昭忠祠奉祀他。我就读的高级小学，即由这所“昭忠祠”改建而成。当时厅堂里仍坐着他的塑像，还有不少同他一道就义者的牌位。有副对联，表扬他有“天地正气”，是“古今完人”。厅堂变成全校师生集会的礼堂，我每天来回总要在他像前经过几次，有两年之久。所谓“正气”与“完人”，我似懂非懂，但对这位乡贤确实非常尊敬。七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仍很清楚。

就在这里读高小一年级（即今五年级）时，级任老师兼教我们语文课的陈唯吾先生受到了我们真诚、热烈的欢迎。不但教书活泼生动，教学态度也非常亲切热情，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同他接近。但不到几个月，忽然不来了，不知是何缘故。问问别位老师，或说不知道，或含糊。同学们非常盼望他回来。他终于不能回来了，据说已被捉去杀了头，只二十多岁！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都未明白，可他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直到十几年前江阴市为乡前辈刘半农先生等三兄弟建成“三刘纪念馆”，邀我回去参加开馆典礼，便道参观了市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才终于明白了陈老师为革命而牺牲的真相：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在基层工作，哪里有困难就调他前往，牺牲时已任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被捕杀

头。保留的一张照片分明是当我教师时那个样子,年青而果决。我的怀念已有分明的着落。高小两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阎典史和陈先生这两个人。

那时江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去杨舍镇读梁丰初中时,有个晚上突然听到镇里响起枪声,人声鼎沸,谁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学校紧闭大门,我们都从床上爬起,挤作一团。天明后听说已没事,大家才敢去镇上看动静,原来是数十里外的农民有组织地赶到这里来“暴动”:夺枪械、弹药,“抢”典当,向几户地主借粮、借款。此外秋毫无犯,早在后半夜起就迅速撤走了。

这使我简单地联想到所读《水浒传》时赞赏过的劫富济贫。

不消说这样的活动在人烟稠密的故乡是很容易被发现、破坏的。于是就传出了很多“有人被杀头”的消息。当时这样做太冒险,但我很同情这些受害者,因为我知道乡下有很多贫苦人。我外婆家就在乡下,那个村里农民借债还不出,作抵押的土地隔三年就要交给债主,变成佃户。如再欠租,那就说不定哪天还得被抓去吃官司。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不死。

1931年在无锡读高中时我遇到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引来全国群情愤慨。上海各大学学生发起去南京请愿,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参加了无锡学生对上海学生的支援,踊上拦下的火车一道前去。到南京后立即被大批军警截往当时的“中央军校”住下,当晚听到蒋介石的讲话,重申其“当然要抗日,却应先安内再攘外”这个调子。大家不满意。第二天一早便被载去中山陵谒中山先生墓,下午大批军警又把我们赶上火车,押回无锡了。此行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毕竟表现了我们中国的民气。当时我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很爱读他写的《小言论》。我们年级订阅这个刊物的同学有十多位。游行回来后我们全参加下乡宣传抗日的队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工作。

1934年暑后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前海经常有日本军舰停泊,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正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东北三省已经沦陷,眼看青岛亦危如累卵,亲历此境,十分沉重。接着是冀东紧急,进一步波及北平、天津,整个华北动荡,导致屈服妥协的几次“协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应时蜂起,各地同学纷纷响应,青岛山大学生以及很多中学生一道参加。那时我们读到“生活书店”出版的部分进步书刊,特感新鲜,对社会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没有一味钻进读书和学习文学创作的兴趣中去。我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街头演讲及下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张家店》等),不会演就帮做些杂事,写点宣传抗日的文字。在此之前我原是清静宽敞的图书馆中常客。这段生活充实了我,也结交了一些好友。他们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后来介绍我参加,我欣然参加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全面抗战,当年11月我随校辗转西迁,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知道其中有的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担任各种重要工作。他们在和我同学时大都已是地下共产党员,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我由衷敬佩他们。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民族的脊梁。

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继续学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我决心在自己认定的工作与生道路上,学习这些同学、好友的志气和精神。我们曾互相这样勉励:做个正直的,坦率的,对国家社会多少有点奉献的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不灰心丧气。当然并不是有了这种愿望



就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但觉得这应是我的价值观之基点。

我读完大学已找到不差的工作,同时报考了研究院。接到录取通知后,我毅然即由重庆前去昆明南面的澄江。文科研究所设在县城外荒山上一座名叫“斗姥阁”的破庙里。就在这里我力求保持着与大学好友们的联系,开始读着、积累着、思考着各种问题。好友们行踪难定,联系终于中断。但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对我来说,他们是最具体的榜样,当时我对革命者的一些认识多来自感性。为文学兴趣所限,也由个性与认识有关,我对太抽象的思辨每觉近于虚玄,未免偏执,却也不致过于迷信教条。我觉得胡适文章的明白清楚,朱光潜论文谈艺的具体生动有趣,不简单。他们深通西文,研究中国问题,极少常见那种生吞活剥,佶屈聱牙,硬装出来的洋味。批胡高潮和“文革”浩劫中胡被目为战犯、洋奴,“文革”中朱被目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尽可驳斥或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难道他们不能算是认真的爱国者?总算现在对他们已改变得比较客观了。他们都已逝去。采取客观态度才可以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张抗日到底,反对投降派。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和青岛参加进步文艺工作,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密报当时教育部,说我有“奸匪”(指共产党)嫌疑,朱家骅即密令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把我与我向无政治兴趣的妻子一并中途解聘。上海解放前夕我与姚雪垠合编的周刊《报告》第一期出版立即遭禁,其中我写的一篇文章便是《彻底破产的教育》,为此几遭不测。解放初期我极为一派清明的开国气象所感动,完全信任,甚至也紧跟过照批俞平伯、胡适、胡风诸位。号召帮助整风时还是应领导与各报刊之“热情”邀约,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写了几篇文章,结局是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主要罪状据批为主张“教授治校”,在大学里居然可以“学术至上”。定案后把我赶出中文系,降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株连妻子受歧视,儿女升学难,就业难,跟我一起,蹉跎十几年。迟至1961年我才得以回系继续任教。1966年“文革”开始,我和许杰、施蛰存又被首先投入“监改”,从“右派”而“摘帽右派”而“老右派”,直到“文革”覆灭,得到彻底平反,整整蹉跎了我二十年最可以多做些工作的宝贵时间。我们不知说了写了多少对新社会的歌颂却被说成是“抽象肯定”,而于应邀之后仅对个别事情、个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则被说成是“具体否定”。越分辨被判成越“顽固”越“反动”。

这个时期我经常想到在青岛一道参加救亡工作的好友们,想到了他们当年的意志和精神,也想到为什么甚至他们也会蒙受到冤屈。这使我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积累专业研究资料。二十年间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只有自己觉得这种积累有用,即使这些卡片将始终只能塞在我的抽屉里,也有意义。也许这只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但到底并没有把这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虽因十多年来担任面上各种工作,未有时间好好利用这些材料,内心觉得假我以年尚有可能利用它。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1984年去美讲学回来,我入了党,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当时年已七十,复何所求,只想以此鞭策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个人恩怨须记?觉得认真总结严重教训,一致向前看才是道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